

解析中國模式

講者：胡平

《北京之春》雜誌主編

2012年11月20日

本次工作坊邀請到《北京之春》的雜誌主編胡平先生，演講的主題是解析中國模式。

當代中國問題可說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問題，未來十年中國的變化不只在中國，對台灣以及世界都會有巨大的影響。但理解中國很大的困難在於沒有現成的理論框架，過去可以將中國歸類為共產國家，或者極權主義，甚至在六四之前也可以和蘇聯、東歐一樣，以哈維爾(Vaclav Havel)的「後極權主義」定義。然而在六四之後，適逢蘇聯、東歐等共產政權瓦解，中國卻走上不同的道路，從此過往的理論框架要拿來解釋中國變得非常困難。

胡平先生認為，描述中國時最重要的是要瞭解「中國如何是」，也就是中國如何成為現今的模樣，因為當代中國是一個動態的結果，停留在靜態的描述會遺漏掉最重要的一部分。從1949年中國共產黨掌權以來，六十年間發生非常大的變化，包括六四至今的二十三年間也有非常多的改變。因此要談論中國模式，有必要對中國這六十年歷史做一個簡要的回顧。

斷裂的歷史記憶

1949年開始，中共為了貫徹意識形態的目標，展開各種的政治運動，直到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中國又進入一個巨大的轉折。

七十年代，中國在經濟上非常窮困，農村的貧窮問題嚴重到了農民飢餓已成習慣，「吃飽」對當時的人來說是一件無法想像的事。經濟生活的另一面向則是全然的管制，包括配給的票證買賣制度及配給的工作分配制度。管制的買賣侷限了人民對經濟生活的想像，並認定沒有管制的市

場買賣將帶來全然的失序，管制的工作分配也導致夫妻分居成為社會常態。

這些不同面向的生活差距，在進入八十年代、中國增加國際交往後受到一定程度的衝擊，例如留學生可以申請配偶同行伴讀的獎學金，這種視夫妻在一起生活為理所當然的社會制度，使當時的人對社會生活的想像開始有了變化。

但是中國的變化太快太大，大到年輕人會覺得幾十年前父祖輩的行為和邏輯不可思議，世代之間已無法透過言說和想像來連結彼此的歷史記憶，進而擁有歷史共同感。不只是毛時代的歷史記憶，如火如荼的八九學運，其參與的人數之多、規模之大、時間之長都非常少見，但是許多入獄的民運領袖，出獄之後卻發現中國社會又變了，甚至連曾經同仇敵愾的參與者、城市市民也如遺



徐斯儉主任（右）贈送清華大學紀念品給胡平先生。

忘般不再念及此事。

當代中國的歷史，如同各自成段的短篇小說，批評中國非常容易，因為它的變化大到自相矛盾，以致持任何立場都有可批評之處，但解釋中國卻非常的困難，一定要做動態的整體描述。

全方面的改革時代

毛時代在經濟上極度貧窮，文化上因為文化大革命及封鎖西方文化，形成了文化沙漠，政治上則因為一連串的政治迫害，使得短短二十年中，社會各階層都經歷過整肅。中國在經濟、政治、文化的全面失敗，引起社會強大的反彈，因此在毛澤東死後，各方面都興起改革，包括政治上的平反冤假錯案，及「思想解放運動」，八九學運就是在這樣的脈絡下發生的。

同於七十年代後期興起的是經濟改革，依中國共產黨的官方說法，經濟改革緣起於安徽省鳳陽縣的小崗村在人民公社時期冒著極大的政治風

險，打破公社體制，改採「分田到戶」的經營模式，並由村中二十幾戶的戶長秘議簽署契約，表明如有戶長出事，其他家戶有義務照顧其家人。此事被官方視為經濟改革、農地恢復私有化的開始。

另外也有一派認為，中國經濟改革是由於廣東省一帶，在 1949 年至 1979 年間，連續發生多次農民大規模逃往香港所引起的，由於當時邊境的封鎖線十分嚴密，許多人在逃亡過程中面臨各種死亡意外，同時也面臨失敗後叛國投敵的政治罪名，但即使如此逃亡者仍絡繹不絕。七十年代後期，中國共產黨派許多官員到廣東省防制逃亡行為，按照《大逃港》（陳秉安 2011）書中的描述，是這些大規模逃亡觸發了經濟改革，在官員與逃亡失敗者的對談中，這些貧下中農、甚至黨員非常清楚的表達：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好。

因此，即使在改革初期用了非常多社會主義名詞，但事實上經濟改革就是要恢復革命所打倒的資本主義，這就產生一個政權合法性的問題：



同學們踴躍參加胡平先生演講。

如果當初的革命是對的，為何至今要經濟改革？如果當初的革命是錯的，憑藉革命掌權的中國共產黨又憑什麼應該繼續掌權專政呢？

合法性基礎的動搖導致中國不得不執行社會監控，但經濟改革的逐漸深化，又加速社會大眾認知到中國共產黨合法性的不足，從民間到知識分子、甚至到官員中，產生了或許該認同爭取自由民主的力量，以及自慚於使用鎮壓手段的思想變化。這也是東歐、俄國變革的基本機制，東歐的抗爭發生當時，統治者不是沒有武力，而是失去對革命的信仰後，無法說服自己鎮壓是正當的，因此政權可以平順地轉移，然而在中國發生了六四事件。

中國模式的經濟改革

與東歐相似，六四事件發生時不只趙紫陽，還有一批官員都不贊成暴力鎮壓，鄧小平內部講話所提出的鎮壓理由是：要決定走社會主義或是走資本主義路線。為了符合當時維穩鎮壓的正當性，六四之後中國會有短暫的改革倒退，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發表「不問姓社姓資」的宣言，中國才又恢復經濟改革路線。

胡平先生解析，六四暴力鎮壓的影響是，中國政府在此前以包裝的方式，維護社會主義的假像與政權的合法性，六四之後，中國的政權已擺明是靠武力維繫，至此卸下社會主義包袱，各地隨著更徹底的經濟改革，貪污腐敗問題更加嚴重。

相較於東歐和俄國進行了民主改革但經濟改革卻不順利的情況，尤其在起步時經歷了滑坡，而中國這種不顧政權合法性的發展模式，經濟發展卻相當迅速，究其原因其實相當簡單：

第一，中國人口非常多，相當於日本的十倍，所以中國的人均產值只要有日本的十分之一，

國內生產總值就趕上日本了。

第二，東歐和俄國在經濟改革之初，將公有財產重新以物歸原主、買賣承包、分產等合理的方式化為私有，其中大型國有企業多以股權分產方式處理，造成產權過於分散而無實質管理人，導致生產效益低落。因此一開始必定會經歷滑坡，直到市場的自然過程產生出資本家後，才會有效率經營。

除了物歸原主、買賣承包、分產三種方式之外，香港學者張五常更提出第四種模式：直接將產權分給官員，因為除此之外官員不會贊同改革。雖然這個理論最後沒有成為官方政策，但六四事件之後，中國各地的官員透過各種方法實際上執行了這項理論：各黨委書記成了各公司的董事、黨委會成了董事會、地方政府成了地方的董事會。

因此從中央到地方，政府都非常有錢，經濟改革一路順利地走下去，唯一的問題是「道義」上站不住腳。在其他國家富豪多是家族累積或個人能力，但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產生的巨富靠的是整個政權巧取豪奪，因此中國的貧富差距問題比其他國家更嚴重，一方面是程度更甚，另一方面是性質更惡劣。

財富分配過程的不正義是中國政府對自由民主的恐懼根源，其關鍵則是六四事件的威攝，造成社會普遍的高壓與恐懼，才利於政治菁英在經濟上的巧取豪奪。這個政治經濟結構又與全球化結合，在沒有技術、資金、市場的條件下，中國學習台灣發展模式，引進外國資本技術，利用本國廉價勞工發展代工業。然而經濟發展後生活水準普遍提高，勞動力成本自然上漲，此時中國政府透過壓制手段維持經濟優勢，逼使廉價勞工繼續廉價，這也就是秦暉教授所講的「低人權優勢」。

（整理：黃彥慈）